

從「
戰爭」的悲哀
和「
在異國」的比較

管定規
中西小說的悲劇性

張恆豪

海明威的「在異國」(In Another Country)作者以一種冷智的語調，在凝重氣氛的烘托下，敘說了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中，一羣在米蘭養傷的軍官，他們的鬱悶和孤立，在人在病院中回憶了往昔的英勇，有人失去了生活的信念，有人恐懼着死亡的侵襲，有人變得現實而易於激怒，總之，「我們只知道戰爭似乎永遠沒個完，只是我們不用再參加了。」一羣從人生戰場上撤退下來的人，歷經浩劫，心有餘悸，處身異國，孤立無援，面臨着理想的幻滅、戰鬥勇氣瓦解，以及一切人生價值的蕩然無存。作者的主題，似在宣告兵燹下一種「現在世界」與「過去世界」激盪後的虛無，一種「理想世界」與「現實世界」對峙裏的失落。

在本篇裏，「勳章」是個鮮朗的意象，它象徵着榮耀的化身和勇氣的典型，然而榮耀却逃脫不了孤立的命運，勇氣却屈服於死亡的魔力，這是「物」的反諷。尤其，作者以單一觀點所觀察的那位少校，他曾是位戰前義大利首屈一指的擊劍家，可是在命運之神的垂顧，戰爭的炮火席捲了他的理想和愛情，他變得暴躁、怪癖、容易動情、容易感傷的「失落人」：

「男子漢不該結婚的。」他看起來非常生氣。

「爲什麼呢，少校先生？」

「不要叫我『少校先生』。」

「爲什麼男子漢不該結婚呢？」

「他不能結婚。他不能結婚，」他生氣地說。「假如他要失掉一切，他就不能讓自己處在那種地位去失掉一切。他不能讓自己處在會失掉一切的地位。他該去找一些他不會失掉的。」

他很生氣而痛楚地說着，說話的時候直直地望着前面。

「可是爲什麼他必須失掉這一切？」

「他一定會失掉。」少校說。他注視着牆。然後他低頭瞧着機器，急急地把他的右手從機器的皮帶裏抽出，重重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。「他會失掉一切，」他幾乎要叫起來，「不要跟我辯論！」迅即他叫管機器的人。「過來！把這個該死的東西搬開。」

擊劍的人，一場戰爭下來，却敗於自己的劍下，甚至連機器都有幾分驚懼，此段心路歷程何等的微妙和殘酷，這是「人」的反諷。這些歷盡滄桑的傷兵，正好與科娃酒店裏櫃臺後面的那羣女人，又產生對比的嘲弄。科娃的女郎，她們忙碌於夜生活，在紙醉金迷中打滾，但她們不亂發牢騷，熱愛自己的國家，因國家給她們生活保障，是羣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，這和一逕地回憶過去，孤立不羣，逃避現實的堂堂軍官，終竟有天淵之別，這又是「人」與「事」的反諷。因此，我們覺得在人類和命運的折衝下，導致生命的虛無和失落都是必然的。

從第一段所述的那位立在橋上，面對着米蘭的冷秋賣烤栗子的婦人，以及在槍林彈雨中敗下陣來的軍官，和後面所述的那夾在皮帶上，上上下下碎動不已的手指，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事實：在作者

的意識裏，隱藏着兩種對峙的力量——新生和死亡、轉動和停頓、希望和幻滅，它們象徵着個人和自然的衝擊。人需要勇氣去迎接衝擊，更需要奮鬥去克服自然，但在現實的陰影裏，一些死亡和黑暗的鬱結，又不得不採取自然主義的態度予以認同。就像「這是一所古舊而漂亮的醫院，你穿過一扇門進來，經過一座院落，再從另外一邊的門出去，而常有喪禮從這座院落出發。」一樣，因此，它促使人類引發了一個最永恆最基本的課題——悲哀。

超人與宇宙的抗衡，一直是西洋人探索不休的焦點，然而人類在有限的力量之下，所能掙扎的極限也只不過是困獸之鬬的喘息罷了。無論是普羅米修斯（Prometheus）的救贖化身，尤力西斯（Ulysses）的漂泊典型，最後仍逃脫不了意志幻滅的孤寂感。西洋故事中的戰鬥對象，諸如海洋、女人、戰場、爵位，無疑的都具有自然的精神象徵，爲了讚頌人類的意志和勇氣，他們往往把英雄置入於無際無涯的時空中，一如科學家把小小的螞蟻放置在偌大的實驗室裏，隔着適度的距離那樣，冷觀着這羣人物盲目的行動、有限的小智、薄弱的挑戰和永恆的悲哀，像哈姆雷特（Hamlet）、安蒂岡妮（Antigone）、耶絲帕蒂（Aspasia）或是海明威「戰地春夢」（*A Farewell to Arms*）中的亨利，本篇中的少校，最後都難逃命運的規數。緣此西洋小說中的悲劇，都是在表現一種超人於行動的抗拒上，無法超越宇宙而爲自然所敗的悲哀，它是一個自然的悲劇。

而中國却是一個人性的悲劇。「在異國」的悲劇性，完全在戰爭的魔力，使人淪落異國而無家可歸。「拳師的悲哀」雖然也有「用自己的血恨報復在自己的骨肉」的命運成份，但歸結其肇因，却是拳師個人的人性作祟——他誤會了別人到醫院去看他，是存心侮辱，而氣憤出走，立志報仇。因此，「拳師的悲哀」是個典型的人性悲劇。自然悲劇的衝突在於自然（Nature），人性悲劇的衝突却在於人事（Convention）。

人性的糾葛，乃是人性悲劇最大的特質。東方的哲學是極具智慧性的，中國人因飽嘗命運的捉弄

，故能樂天知命；因深感於人事的無常，故能逆來順受；因患苦於理念的逆攪，故能勝物不傷；因透過天人的觀照，故能了悟人類無法與天地並生。它的悲哀完全是人與自然間接觀照而來，而西洋人的悲哀，却是征服自然，和自然直接衝突所造成的。

正因為有如此天人無法並存的缺憾，中國民族乃轉向於內在的搜求，以尋求一個理想的夢園，諸如陶潛的桃花源或是李白的天姥仙境，都是透過想像而所憧憬的心靈境界，但西洋民族却反轉向於外在的追尋，因此像烏托邦、香格里拉島，或是福克納的 *Yoknapatawpha Country*，雖也透過想像，但却是所嚮往的現象世界。這是探討中西小說的悲劇性的基本關鍵。

III

從安特留·蘭 (Andrew Lang)、鹽谷溫、鄭振鐸、聞一多和蘇雪林等人的考證，我們知道，在神話和圖騰時代，中西神話共出一源的假設具有可能性，這時人類所面臨的敵人便是命運。就希臘神話而觀，希臘的命運之神 (三個女神，以線索拉着每一個凡人)，都是人格的化身，其悲劇的產生，大都是由人與命運直接衝突後所面臨的失落，如赫拉克斯的流浪，最後仍不免敗於命運之手。而中國雖亦有共工氏這類角力英雄，大自然也具有人性，但大自然並不見得是人格的具象化 (像西洋的月神狄愛娜 (Diana)，有名字，而且是女性，有來源，有家族環，更有神蹟)，它們只是在人與命運對照的剎那予以擬人化罷了，換句話說，中國的天道都不是人格的化身，所以它的一切悲劇大多是源於人與命運間接對映後所感悟的不足，如夸父逐日，化為鄧林。嫦娥奔月，后羿悵然。這是中西小說悲劇性的第一點不同。

後來，人類從失敗的經驗中漸漸省覺，命運是萬能的，既不可解又無法超越，西洋民族乃轉向外在的自然世界，作瘋狂的直線式追尋，在人與自然對立的情態下，表現出一種意志的奮鬥精神，但由

於生命力的旺盛，無法鑒足物慾的渴求，乃在一連串的爭戰鬭力的過程中，飽嘗生命失落、希望破滅的痛楚，西洋的悲劇因此而埋下根結，這從阿底拉斯與戴奧尼索斯的神話可尋得心證。而中國民族乃轉向內在心靈的潛修，了悟到人與自然是和諧的，花開花落，方死方生，人從自然來，必歸返於自然的道理。所以表現出一種圓融的人生觀照，而憧憬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但因為氣質與理障的限制，不免充滿了理念變質、人事困頓的愁悵，這是中國悲劇的癥結，從水滸傳和紅樓夢可得到啓示。此為中西小說悲劇性的第二點不同。

西洋哲學因具有如此天人對立的傾向，所以表現在小說上的基本衝突便在於人與宇宙、人與自然；而中國天人合一的闡揚，却造成了小說上的基本衝突在於人與人性、人與社稷。同樣是以人為本體，因此中西小說特別重視人性的洞察力（Insight），但西洋的小說性向偏重於人性意識的真偽，故求真求實，其價值系統則建構在外在世界所追尋的表象，因為像線型的發放所以多波瀾；後者的小說性向偏重於人性意識的善惡，故求善求美，其價值系統則建構在內在世界所探求的境界，因為像環狀的聚斂所以有不足。西洋的悲劇癥結在於意志幻滅的痛苦，乃是一個剛性哲學在物質文明下翻車的悲劇，雖有宗教的審判，却在遙遙的未來，故多演化為時代的預言者，如漢密頓的失樂園、卡繆的反叛者、史陀夫人的黑奴籲天錄；而中國的悲劇癥結在於理念變質的悲哀，乃是一個柔性哲學在精神文明下迷途的悲劇，雖有佛道的輪迴，其果報則在現世，故多演化為人類的見證者，如儒林外史、矛盾筆下的老通寶和多多頭、陳映真的「六月裏的玫瑰花」等，這是中西小說悲劇性的第三點不同。

因此，劉非烈的「拳師的悲哀」，具有上述的特徵，乃是一個典型中國小說裏的悲劇，最後拳師的心性發現（Anagnorisis），與坤樹揭下大玩偶的面具後那種我我的顫語，萬發擁有牛車後那種咕嚕咕嚕的濫醉，都具有同類的精神意義，這是一個人為中 Convention 式的悲劇，其苦痛人人都能感受出來。而「在異國」，少校的基本信仰被自然的演變摧殘無遺，一場戰爭打下來，生命的失落則是

勝利的標幟，個人的孤立形成了一種英雄式的悲哀，人與鼠（*Of Mice And Men*）中蘭尼的自殺身死，便是在這種盲目命運的支配下，又一個典型的西洋悲劇例子。劉崎先生說道：「希臘哲學到蘇格拉底時有一大轉變，蘇格拉底強調知識，也就是強調阿波羅精神中以冷靜理智觀察世界的一點。因此，尼采認為從蘇格拉底以後，希臘悲劇的精神喪失了，因為悲劇精神中的戴奧尼索斯精神被蘇格拉底理智的手扼殺了。剩下的只有阿波羅的冷靜理智。此後，西方文化即走向純粹知性主義的道路，由於缺乏戴奧尼索斯生命的力，西方文化便顯得沒有血色了。在純粹知性主義文化之下，科學發達了，科學的發達帶來工藝的進步，工藝的進步，造成了今天的機械文明，生活在機械文明之下的現代人，崇尚功利主義，一切都講求現實近利，缺乏人生的理想，追求物質的享樂，而缺乏一種面對憂患而創造人生的精神。」，這使我們想到：近世紀的西洋民族像一羣瘋狂的騎士，迅雷颶風，狂掃而過，費盡武力去征服外在世界，挖空心思去創造科技文明，在快馬加鞭之下，却忽略了停下來去欣賞路邊的湖光山色，以取得心靈的安寧和平靜，一切的東征西討，反而把人類導入更空虛、更黯淡的深淵！但中國民族，在儒釋道與王陽明致良知的影響之下，却像一個盤腿而坐的道士，只顧於閉眼養神去修習他的內在心靈，對於科學工業，却漠不關心，心齋坐忘的結果，終於坐失良機，工業化的落後，造成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噩運。一個是征服月球後，却更加空虛；一個是保存有美麗的神話，充滿浪漫的遐思，但無法登陸月球。屈林（Lionel Trilling）教授說：「現代文學的特性，即在它能表達對人類意識的破壞和反理性蠢動之悲劇性。」或許是一針見血之語吧？

透過以上中西小說悲劇性的比較，我們得悉一切鬱悶的癥結，如何在歷史的省識中，去重新激發一種悲劇感，像劉述先先生所說的：「我們先要把已鎔鑄的銅像澈底熔化重新鑄造，而後以最高的工藝手腕創造出一個新的完美雕像來」。正視着現代文明的病態，在銷融東西文化之下，站在統一的基礎，去尋覓出一條健康而積極的途徑來，應當是這篇小說比較研究的目的。（續完）